

应对贸易争端造成的保护主义：中国的后 WTO 蓝调

胡永泰 肖耿

甲 中国与贸易伙伴摩擦的升级

自 1994 年，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盈余，而 2006 年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达到 184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 GDP 的 9%，同时由于大规模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和对资本外流的控制，2006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 1.07 万亿美元，居世界之最。中国也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证券的第二大持有者，总额多达 2536 亿美元，仅次于持有 6488 亿美元美国债券的日本。

截止本文写作时，2007 年 6 月，中国的贸易总盈余、中美双边贸易顺差及中欧双边贸易顺差还在持续激增，这使得对中国是否实施不公平贸易行为和人民币币值是否严重低估的关切这两个文题显著升级。2007 年 2 月，美国贸易代表（USTR）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了申诉，要求中国停止补贴。随后，2007 年 4 月又出现了两个针对中国的申诉，质疑中国对著作权密集型产业产品实施的市场准入限制，质疑中国保护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法律体制上的缺陷。

以上所有 2007 年的新事态预示着中国、欧洲和美国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贸易战。在本文中，我们将检视与中国有关的贸易摩擦的原因，并提出减少摩擦的政策建议。我们的讨论具体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1. 贸易失衡造成了哪些问题？
2. 贸易失衡的出现揭示了什么问题？
3. 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一剂良方？
4. 怎么办？

乙 贸易失衡造成了哪些问题？

有一种观点断定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体现了中国向美国“输出失业”，这种观点并不鲜见。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司各特（Robert Scott, 2007）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他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得到了上述论断。根据他的计算，1997 年 495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使（美国）当年损失了 597,300 个工作机会，2006 年 2354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使美国损失了 2,763,400 个工作机会，而由于 1997 至 2006 年间的双边贸易逆差上升，每个州都遭受了净工作机会的损失。司各特认定的由双边贸易逆差导致的 2006 年工作机会损失意味着 2006 年的失业率要比双边贸易差额为零时

高 1.2 个百分点。

还有一种对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更深刻的抱怨，认为它使美国工人被取代，并加剧了由全球化引起的美国工资下调的压力。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引起美国总收入中劳动所占比例降低和扩大美国工资的分布的全球化提供了一贯的解释机制，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就是即使中国在 2000 年占了前苏联、印度和中国（SIC）1383 百万劳动力中的 764 万，中国仍不能被指责是造成上述两种工资变化的罪魁祸首。中国不是主犯，因为还有其他三个与中国无关的情势也对美国的工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技术创新使得资本取代了劳动力。第二，还有一些制度变化降低了（美国）总收入中的劳动所占比例。第三，2001 年前迁入美国的移民（特别是不成比例的非熟练劳动力移民）数量的增加。

基于对前述文献的中立审视，我们的评估是，阻止美国工资（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随着 GDP 增长而上升的力量主要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来源：

70%到 80%的工资下调的压力来源于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和引起工资疲软的制度变化。

5%到 10%的工资下调的压力来源于迁入美国的移民。

15%到 20%的工资下调的压力来源于进口竞争和跨境制造业活动的重新布局。

简而言之，美国和欧洲流传广泛的对中国贸易盈余的抗议实际上是不适当的。即使中国贸易差额为零，但是由技术创新、制度变化、全球化以及移民造成的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收入重新分配的阵痛仍然会存在。而通过扩大贸易逆差的渐进性结构调整带来的额外阵痛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丙 贸易失衡的出现揭示了什么问题？

在讨论贸易失衡给中美两国带来的经济问题之前，有必要提及一个引起争议的基本数据问题，即在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规模上，双方存在着严重分歧。表 1 显示，2006 年中国统计的双边贸易赤字（1450 亿美元）只有美国的统计数据（2510 亿美元）的 57.7%。双方对 2006 年贸易逆差的估计值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仍然体现了过去几年来统计准确性上的巨大改进。第一，前些年的数据差异是远远大于 2006 年的差异，举例来说，1993 年中国对双边贸易逆差的估计值只有美国的 25.6%。第二，最近一段时期，两个国家已能在双边贸易存在逆差还是顺差上达成一致。1983 至 1992 年期间，中国方面的数据显示，在对美贸易上中国一直保持赤字，但同期的美国数据则显示中国方面存在盈余。

表 1 1990 和 2000 年全球劳动力分布

单位：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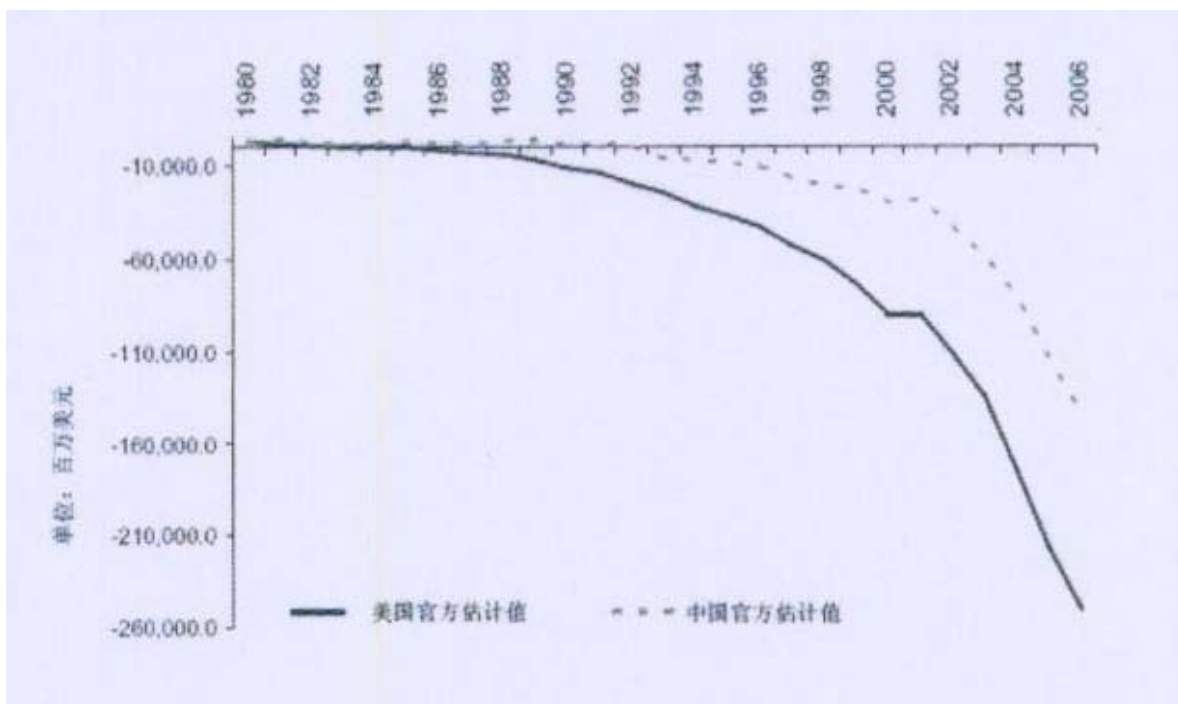
	总计	非 SIC 国家			SIC 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中国	印度	前苏联
1990	2315	403	680	687	687	332	213
2000	2672	438	851	764	764	405	214

资料来源：Freeman, R., 2004. Doubling the global work force: the challenge of integrating China, Ind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Bloc into the world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8 November (unpublished). Our figure for 'total' in 2002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Freeman (2004).

鉴于在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统计方法上的显著差异，每一方都应以不同程度的关切看待双边贸易失衡。中美统计数据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经过香港转口的美中贸易的不同态度。在 **Feenstra, Hai, Woo and Yao (1999)** 工作的基础上，为了本文的分析，我们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出版的《贸易方向》，取美国估计值和中国估计值的简单平均值来测量美中之间的贸易平衡。

图 1 展示了三个项目：中国贸易总差额、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和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中国自 1986 年以来一直对美国保持盈余，从 1997 年开始对欧洲保持盈余，而其贸易总盈余则从 1994 年开始。除了 1990、1991、1997 及 1998 四个年份中国经济下滑，1986 年至今中国对美贸易盈余已超过其贸易总盈余，这意味着中国同期对一些其他贸易伙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

图 1 中美贸易逆差：1980-2006 年中美贸易统计数据的差异



中国的双边贸易差额结构的变化主要反映了全球生产网络稳步向中国转移的进程。在部件生产和制造工序上的新的地理分布方面，中国通常制造价格低廉的部件，并利用国内生产的部件和进口的部件组装最终产品。制造和组装工序快速从日本、台湾和韩国向中国转移，并直接转化成中美双边贸易顺差的高速增长，因为上述转移分别降低了日美和韩美的贸易盈余。简单地说，中美贸易逆差可以通过把韩国、台湾、日本的组装工序和欧洲的生产网络向越南转移来解决，但是这样以来，越美贸易逆差将会增加，而美国总体贸易差额不会发生改变。

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扩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了中国经济金融体制存在深层问题。合并国民收入会计等式揭示了这个问题，总体经常项目余额（其中，中国总体贸易帐户是其中最大的部分）由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控制的企业（SCE）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储蓄—投资决定。具体如下：

$$CA = (T - G) + (S_{SCE} - I_{SCE}) + (S_{private} - I_{private})$$

CA 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经常项目

$$CA = (X - M) + R$$

X 货物和非要素服务出口

M 货物和非要素服务进口

R 海外净要素收入（如要素服务出口）

T 国家财政收入

G 国家支出（含国家投资）

S_{SCE} 国家控制企业的储蓄

I_{SCE} 国家控制企业的投资

$S_{private}$ 私营部门的储蓄

I_{private} 私营部门的投资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财政状况(T-G)一直呈小额赤字，显然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是 2000 年以后经常项目盈余不断膨胀的原因。经常项目盈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家控制企业和私营部门的总储蓄超过了其投资支出。由于非政府部门储蓄率稳步上升，经常项目盈余也稳步扩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指出经常项目盈余和盈余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体制没能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种结果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1994 年以前，国家控制企业贪婪地吸取银行贷款，进行疯狂的投资，导致经常项目通常出现赤字，也产生了大量银行呆账(NPLs)。1994 年以后，由于政府对国有银行(SOBs)实施了更严厉的控制，一旦银行放贷超过信用配额或者呆账率增加过快，银行官员都被撤职，国有银行放慢了对国家控制企业的贷款增长速度。由于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部门之后没有把新释放出来的贷款重新疏导，为私营部门的投资进行融资，结果，出现了过多的储蓄。这种现象体现了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干预上的失败，但这种失败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直到最近，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仍然低于国家控制企业。第二，由于私营企业倾向于逃税，商业银行没有可靠的办法评估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结果，过多的居民储蓄以经常项目盈余的形式散逸到国外，不充分的金融干预就使得发展中的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

这种反常的经常项目顺差现象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台湾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当时所有台湾银行都是国有，都按照《政府服务条例》运营，按照当时的条例，银行官员必须偿还他所核准放出的任何一笔呆账。结果，金融干预出现了极大的失败，使得 1986 年台湾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1%。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产生台湾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其原因是中国仍然存在相当大规模的国家控制企业的投资。

为什么非政府部门的储蓄一直在上升？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部门的总储蓄规模从 1978 年的 20%上升到 1987 年的 30%，而到 2004 年已达 45%。在讨论储蓄率上升时，人们普遍认为储蓄率上升反映了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在面对大范围私有化亏损中的国有企业这一进程时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似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也在上升，而他们并没有在国企上班，自然不会担心会在国企部门丧失工作。

相反，我们发现有两个普遍性的变化使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储蓄率显著上升。第一个变化是“对未来担忧的加剧”。国家对医疗、住房、亏损企业及教育补贴的稳步下降，养老金管理不当，都引导人们存钱，用于应对未来可能的厄运（如疾病，失业等）、买房、养老、教育子女。

第二个变化是官方对市场经济模式态度的持续转好。鉴于高额资本回报率，对商业持日益友好的态度的中共一直毫无疑问地鼓励城乡居民进行投资性储蓄（例如，人们对未来的更为乐观的预期推动着投资驱动的储蓄）。我们这个投资驱动的假设并不是新提出的。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1988）对西欧美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投资需求似乎一直是私人储蓄、寻求资本增值背后的驱动性力量”。

对于经常项目盈余存在并不断上升，我们认为这两种现象存在一个共有元素，即中国的金融

体制。事实上，储蓄行为并非独立于金融体制成熟性之外，一个先进的金融体制由一系列金融机构组成，这些机构能通过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来化解风险，把储蓄转化为教育贷款、住房贷款以及流向私营部门的其他类型的投资性贷款。其他条件不变，金融体制越成熟，储蓄率就越低，这个假设已得到 **Liu and Woo (1994) and Woo and Liu (1995)** 规范统计验证。表 2 显示中国存在经常项目盈余，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恰当的金融干预，而盈余的持续增长则是因为不健全的金融体制没能化解风险，降低（对未来不确定预期而导致的）储蓄，没能提供足够贷款（来减少投资驱动的储蓄）。

表 3 显示了美国贸易总差额，美中贸易差额。美国贸易总差额至少从 1980 年以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远远大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这种失衡模式揭示了三个结论。第一，美中贸易逆差仅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 22.4%，因此，即使通过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把双边贸易差额降到零水平，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仍然很大。第二，（美中）双边贸易盈余和逆差同样由造成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因素引起，即由 2001 年生效的布什减税措施和 2001 年后军费增长带来的大规模年度预算赤字引起。第三，高度成熟的美国金融体制（它能使得次级抵押品市场和公司垃圾债券变成消费和投资，这是美国金融体制的首创）降低了美国私人储蓄率。

很明显，美国总体贸易逆差能够持续可能仅仅因为外国放贷者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抱有信心，当然也因为东亚地区的中央银行乐于持有总量不断增长的美国金融工具。这时，悖论产生了：一方面美国国会非常担忧贸易赤字，而另一方面外国人对美国经济未来抱有如此的信心。而他们不可能都对。

丁 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一剂良方？

中国至少从 2002 年以来就处于要求人民币显著升值的外国压力之下。2002 年 12 月，日本大藏省的黑田东彦与河合正弘(Haruhiko Kuroda & Masahiro Kawai 2002)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制止中国把通货紧缩输出到全球各地。2003 年 9 月，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宣称，中国必须把人民币升值当作消除全球收支失衡的一项国际责任。2003 年 9 月，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莫里斯·戈德斯坦和尼古拉斯·拉迪 (Morris Goldstein & Nicholas Lardy, 2003)提出，人民币立即升值 15%到 25%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因为这一步会消除“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入和储备增加的诱因，外资流入导致的货币供应将不会与稳定国内经济的需求相冲突”。

2007 年 3 月，莫里斯·戈德斯坦(2007)向美国国会申明了他的观点：

人民币目前被严重低估，人民币对中国贸易伙伴货币平均有 30%或者更多的低估，而对美元则有 40%的低估。美国财政部拒绝把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尽管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仍旧拒绝履行全球汇率政策仲裁者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宪章中早已写明。中国须向外界提供一个有意义的“首付定金”，

先使人民币从现在的汇率升值 10%到 15%。一旦中国不能成功地在外汇市场上大幅度降低人民币币值，则这一失败应该促使（美国）财政部预期在 2007 年 5 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反映（中国的）“货币操纵”行为……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回到它的根本，认真履行其初创者为其设定的全球汇率政策仲裁者的决色。

我们将使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分析本部分开头所列的问题，并对上述论断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是否如黑田和隼雄（Kuroda & Kawai(2003)所断定的那样，中国向国外输出通货紧缩？黑田和隼雄论断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将日本通货紧缩归咎于中国通货紧缩的影响，因为两者发生的时间没有交集。日本的通货紧缩是由 1992 年股市、房地产泡沫爆发引起的，而中国 2000 年才出现贸易项目盈余激增。实际上，对华贸易在 2003 年以后一直充当着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由于日本对华的持续高额投资支出，中国从日本吸取了庞大规模的中间产品、机械及资本设备。

或如弗里德·鲍格斯坦(Fred Bergsten, 2007)所言，人民币升值能降低全球失衡？莫里斯·戈德斯坦 (2007)建议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 40%来消除中国贸易总盈余及消除美中贸易逆差。但是这种举动只能伤害中国而不能“拯救”世界。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升值 40%以后，为七国集团（G7）市场生产的外国在华企业会把生产线移向其他亚洲经济体（例如越南和泰国），从那里出口而七国集团也会继续从这些国家进口同样的货物。没有亚洲所有国家（货币）的联合升值，人民币升值只会改变全球失衡的地理分布，而不能消除全球失衡。

如何实现区域货币对美元联合升值？当某一货币大幅升值达到 40%时，假定所有亚洲货币都跟进的想法是天真的。亚洲货币最后一次联动发生在 1997 至 1998 年间的经济危机期间，当时尽管有人预测人民币也会跟着升值，但中国没有效仿其他国家让人民币升值。难道美国政府现在要把一场货币升值攻势一个接一个地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发起一场汇率上的激进主义浪潮？由于多种原因，这不是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理想选择。

一场立即进行的、大规模亚洲货币联合升值将毫无疑问使美国受益吗？我们看不一定。外国对美国储蓄缺口融资的突然中断将导致经常项目余额为零，而这种情形要求美国出口立即增加和（或者）进口立即减少。只有存在生产能力实质性过剩，或者国内需求发生实质性下降，可以向国外市场释放国内货物时，出口才能迅速增加。只有在存在可以替代进口的过剩生产能力或者消费货物或最终产品的替代品需求实质性下降时，进口才能迅速下降。由于当前美国经济不存在实质性过剩生产能力过剩，经常项目逆差立即消失就必须以国内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为条件，而这种下降来源于大规模负面的财富震荡——可能以股市崩盘或通货膨胀率飙涨的形式发生。

或如戈德斯坦和拉迪（Goldstein & Lardy，2003)所说，人民币不升值会导致中国的高通货膨胀？尽管为了应对投资支出的持续增长，中国政府高调实施反通货膨胀，但是中国货币供应量并没有急剧下降。难道如一些分析家所警告，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一点也没有。没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投机性资本流入和外国货币储备的增长都不可能带动货币供

应的扩张。除了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的对冲措施，中国还利用控制银行放贷的信用配额。实际上，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是国家控制，其高层行政人员均由国家委任。面对银行利润最大化和跟随来自总理办公室的命令之间的权衡，一般认为，银行首长会选择后者。

2005 至 2007 年间的货币供应增长没有显著放慢，其原因是中国未选择实施严格的信用配额措施。第一，通货膨胀率尽管在上升，但仍然处于低水平。第二，中共十七大将在 2007 年 11 月召开，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经济的繁荣是政治的需要。这是一场很重要的大会，将为接下来的五年做出重要的人事任命。

人民币汇率的适当水平是什么？《经济学家》杂志曾根据不同国家出售的巨无霸汉堡价格，计算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2006 年，一个巨无霸在中国卖 10.4 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卖 3.15 美元，所以 2006 年购买力平价汇率就是 1 美元兑换 3.3 元人民币，这与当年实际汇率（现行的名义汇率）1 美元兑换 8 元人民币的汇率不通，形成了对比。这个结论是否意味着 2006 年中国汇率被低估了近 60%？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巨无霸的价格包括非贸易生产要素，而中国这种产品的价格比美国要低。一般而言，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非贸易品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其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发达国家。而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非贸易品价格会上涨，使其非贸易品与贸易品价格比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了论证一般购买力平价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值反映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我们首先得做出以下的定义：

1) 定义中美两国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text{中国, } \text{CPI}^C = (1-a) P^C_T + a P^C_N$$

$$\text{美国, } \text{CPI}^U = (1-a) P^U_T + a P^U_N$$

其中，CPI，消费价格指数

C，中国

U，美国

P^i_T ，i 国贸易品价格

P_N , i国非贸易品价格

a , 非贸易品价格的权重

2) 定义购买力平价汇率

$$e^{PPP} = CPI^C / CPI^U$$

接下来我们应用如下均衡条件：

货物套利等式

$P^{C_T} = e^{\text{实际}} P^{U_T}$, 其中 $e^{\text{实际}}$ 是以每美元若干人民币表示的实际汇率 (现行名义汇率)。

每个国家里, 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关系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P^{C_N} = d P^{C_T}$

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 $P^{U_N} = f P^{U_T}$

3)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后者

$$f > d > 0$$

现在, 我们可以得出购买力平价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

$$e^{PPP} = CPI^C / CPI^U$$

$$e^{PPP} = [(1-a+af)/(1-a+ad)] e^{\text{实际}}$$

$$e^{PPP} < e^{\text{实际}}$$

以上的论证显示，在购买力平价汇率的基础上决定某个国家（货币）汇率的“正确水平”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作标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本来就应该就是低估的，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设定实际汇率水平是很荒谬的（因为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政策）

“正确的汇率”的另一个常用的定义是“市场出清的汇率”，即在没有任何来自央行的干预下由外汇市场自发形成的汇率。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长，按照上述定义，这意味着人民币被低估了。但是如果中国通过取消资本控制来进一步落实外汇交易市场化，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中国私人投资者的分散化投资组合必将导致巨大的资金外流，可能引起人民币贬值。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与“完全的自由市场汇率”相比，现在的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就明显是高估的汇率了。当然，没有人清楚“完全的自由市场汇率”会高于或低于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水平。

假定“完全的自由市场汇率”是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存在资本流出控制的市场出清汇率”是1美元兑换4.5元人民币，假定政府立即停止干预外汇市场，并在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监管、管理水平及科技能力数年后取消资本控制。这种特殊的两步走市场自由化（我们称作方案1）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停止市场干预后人民币升值，达到1美元兑换4.5元人民币，而取消资本控制后，人民币又会贬值，达到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

假定中国采取另一种形式的两步走自由化措施（我们称作方案2），实现人民币逐步升值，并在数年后取消资本控制。因为方案1中出现的汇率超调会产生资源流动上不必要的进进出出，所以方案2比方案1要好。前文提到，取消资本控制必然导致人民币贬值超过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也许会到1美元兑换9.5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与方案2相比，方案1会导致各式各样的汇率超调。

实际上，自2005年7月，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方案2。我们认为，中国政府选择的汇率调整的速度太慢，进而造成人民币对欧元大幅贬值。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但并非要像戈德斯坦(2007)提出的10%到15%的立即升值。

我们认为，某些经济学家呼吁采用汇率机制解决中国外部失衡的主张仅仅对了一半。考虑到中国目前的资本控制，一个自由浮动的货币体制可能意味着，与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实际币值相比，人民币币值被严重高估，因此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但是，目前资本自由流动不是一个可立刻选择的方案。考虑到中国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足之处、已经发生的侵吞巨额国家资产的情况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我们反对短期内允许资本自由流通。

分析汇率管理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在总体宏观经济管理的背景下分析问题，而不要局限于汇率

对收支平衡的影响。替代性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极有可能比促进人民币升值的单一政策的效果要好。我们总的观点是，因为国际收支平衡仅仅是社会主要关注的政策结果中的一项，汇率只是影响收支平衡的一个因素，完全集中于这一个政策目标（这种目标在重要性上并不高于其他目标），并利用一个特定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并非良策。

戊 怎么办？

导致美国痴迷于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巨额贸易失衡，而在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节省劳力技术进步所要求的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美元贬值和贸易壁垒会放慢结构调整的步伐，但不能阻挡这种调整，因为美国结构调整的主要驱动力是技术进步。最佳选择是强调多边行动以实现若干重要目标的一揽子政策。仅依靠一个地区（中国一国），依靠单一工具（人民币升值一种），完全指向一个政策目标（外部失衡）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愚蠢的。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美国应当做些什么。国会应当加快降低财政失衡，扩大贸易调整协助计划，特别是提高年轻工人的技能。虽然经过 2002 年的全面检讨，贸易调整协助（TAA）计划起到的作用仍不充分。蕾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2007）指出：

参加水平仍然出奇地低，这部分地由于劳工部模糊不清的解释和根本就拒绝让四分之三的够资格的工人受益的做法。贸易调整协助（TAA）计划每年只帮助了少于 75000 新工人，与此同时拒绝了超过 40% 的全部雇员申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劳工部对贸易调整协助条例的解释把数量不断增加的、被贸易取代的服务业工人排除在外。2001 年到 2004 年间，平均只有 64% 的贸易调整协助计划参加者找到了工作。而新工作的收入要比之前被取代的职位低 20%。

很明显，贸易调整协助计划需要进一步改进。布雷纳德（2007）提议建立工资保险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可以使美国社会安全网络同由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构调整更相契合。

中国该做些什么呢？有一个显而易见短期的政策组合，包含三个部分。第一，2005 年 7 月以来的人民币稳步升值的进程必须加快，并更积极地把它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利用。第二，进口自由化必须加快（例如，认真履行 WTO 成员资格谈判期间的承诺，如知识产权保护（IPR）等），而且要使进口自由化程度超过 WTO 的具体规定。

这个短期政策组合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例如，特别是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吸收过剩储蓄，并以进口密集型投资（例如，购买飞机和送学生出国接受教育）为重点。必须给公共工程和国家控制企业投资设定时限，因为从远期看，公共投资的增加可能伴随着

寻租现象的日益增多，而这又是很浪费的（例如，在日本出现的给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岛建一座大桥而使得与政治家关联的工程公司收益），增加的国家控制企业的投资可能会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

经常能听到有人要求中国通过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平衡经济增长。这种通过增加消费的建议没有错，但是中国现在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处于家庭和公司控制之下，尽管面临种种限制，他们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满足消费，而不需要政府教他们怎么花钱。

由于中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网络还处于初创期，很多中国人仍然选择积攒一大笔钱，以备大病之用。由于没有学生贷款项目，家庭也不得不为子女教育预存一大笔钱。虽然中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获得资本收益购买房产，但是大量新建住宅区内落后的道路、地铁及学校设施限制了他们搬进新房消费。鉴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结构性限制因素，上述的这些措施都是他们的最佳投资及消费选择，但也造成中国居民消费仍然很低，储蓄率依然很高。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增加中国的消费？

在上述事例的背景下，答案很明显：建设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制；开设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计划；建设更多公路、地铁和学校；但是化解过剩储蓄的最佳办法不在于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政府吸收储蓄，而在于建立改进了的一种协调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的机制。建立现代金融体制不仅能实现这个目标，还能增进福利，通过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为工具化解风险来降低储蓄。总之，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形成运转良好的金融、计划、监管体制，以此把仍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关数据显示，4.8 亿农民和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只有 120 美元）和过剩的资本（现在表现为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和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利用起来。

金融部门发展的重中之重是竞争性国内私营银行的出现和成长。WTO 协议要求中国允许外国银行 2007 年以后在同等条件下与国有银行竞争。因此，不允许土生土长的真正意义上的私营银行出现是不应该的。同时也没有理由优待外国银行，歧视国内私营银行，没有理由不允许中国最好的金融头脑与外国最好的金融头脑竞争，并实现与外国银行同样辉煌的业绩。

因此，我们建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资产重组，其中几家可以考虑重组分化成几个地区性银行，以便进一步私有化。与此同时，开办新银行的法律规定必须放松，对利率的控制也必须放松。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金融部门自由化的进程不能快于国家金融监管能力的发展。即使实现了金融自由化，金融危机的替代品——金融萧条的危险仍然存在。一个现代的金融体制需要现代的金融监管和使之良好运转的审慎的管理。

把一些国有地区银行私有化，包括卖给外国银行会是很好的选择，这有利于把现代银行技术向中国转移。越多的本地职员在外资或合资银行受训，则未来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经理的储备就越大。如果加快推动健全的国内私营银行机构的发展、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的进程加快，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将必然缩短，并为更有效地调节利用全球储蓄做出贡献。

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必须推进健康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政府可以借鉴许多国际经验，看看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怎样利用各种计划把投资信用引导到农村地区的。特别地，我们希望政府的注意力能集中到印度尼西亚的成功经验上，该国成功地在农村实施自我维持、自负盈亏

的银行制度——乡村服务站制度(Unit Desa System, UDS)，这给如何加快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讨论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当允许新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只要存在充分而审慎的监管，这些机构就能把当地储蓄运转起来，为当地投资融资。

人民币币值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可能是国际货币史上的第一次：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一个持续的时期内搅动了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这种反常情况揭示了在中国回归国际舞台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两点情况：第一，显示了中国已经对世界具有的显著的经济影响。第二，意味着预期中的未来二十年内中国持续快速增长不仅迫使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的结构调整，也要求中国在解决由一国政策外溢出边界而引起的争端时具备更广泛的“全球体系”的视角。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协作方面最重要、最明显的领域就是共同合作，进一步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自由化，至少也要防止这个体系发生倒退。

随着中国继续快速成长，国际争端的范围可能会扩大（特别是在中期），包括国际对中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和环境保护的关注。但愿世界能在解决诸多未来共同问题时采取多边行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民币问题一样，坚决要求由中国进行单边解决。

（胡永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加州大学教授及中央财经大学长江学者；肖耿：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